

论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

李照成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西南各族中有大量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或在其足迹所至处,或与其在南中的历史活动有所关联,有的则根本与诸葛亮无涉。西南各族中的这种诸葛亮文化现象,毁誉互见,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诸葛亮的历史活动,应深入辨析。

关键词:西南各族;诸葛亮文化现象;盟誓碑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5)01-0033-06

On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Zhuge Liang in All Nationalities in the Southwest

LI Zhao-cheng

(Chengdu Wuhou Temple Museum,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lots of legends and relics about Zhuge Liang in all nationalities in the southwest. Some can be found where he had been. Some are related to his historical activities in Nanzhong. Even som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Zhuge Liang.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Zhuge Liang in the southwest gets a mixed recepti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is far beyond Zhuge Liang's historical activities, which is worth being deeply analyzed.

Key words: all nationalities in the southwest; cultural phenomenon of Zhuge Liang; monument for oath of alliance

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南征,注意“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南征后“和抚”南中各族,“纲纪粗定”,使这一经常动荡的地区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夷汉粗安”。诸葛亮死后,“戎夷野祀”^①,各族人民祭祀他,怀念他。千百年来,西南各族人民曾修建了大量的武侯祠以纪念这位哲人。以清代为例,当时贵州省内就建有18座武侯祠;云南省内更多,计有34座。

历代西南各地有大量以诸葛亮命名的地名、桥梁、关隘和水利设施;耕作、纺织和建筑等先进技术,也被传说成是由诸葛亮传入各族的。在相当一部分民族的传说中,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以善意对待各族的封建政治家,尊重各族习俗,帮助各族发展生

产,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个个难题。而在另一些民族的传说中,诸葛亮则又成了灾难的源头,愚蠢而又凶残。附着于诸葛亮一身的矛盾交织、毁誉互见的种种传说,自晋代以后便流传于西南各族之中,日益广泛,影响较大。这些有关诸葛亮的传说、以诸葛亮命名的遗迹,其内涵实则远远超出了诸葛亮的历史活动,承载着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姑称为“诸葛亮文化现象”。

一、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

后代流传于西南各族中的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遗迹,或在诸葛亮足迹所至的地方,或与其在南中的活动有一定关联;有的则与诸葛亮毫无关联。

与诸葛亮历史活动有一定关联的,如有结盟等。

收稿日期:2014-11-22

作者简介:李照成(1949-),男,四川成都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及文物。

据史志载,南中各族“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汉族官府与南中各族、汉族移民与各族以及南中各族之间有了矛盾,常用结盟的形式来解决。如用盟约解决牂牁郡万寿县夷民间采盐的争议,“汉本有盐井,汉末时夷民共诅盟不开”。诸葛亮也曾与南中相关民族有结盟之举。《华阳国志》载南中各族:“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此。”^[1]铁券,即象征永久的铁铸的盟书;瑞锦,也应指用珍贵的丝织品书写的盟约。由上可知,诸葛亮与相关各族的这些盟书,历经一百多年后至东晋时各族仍妥善收存,并在每次与汉族官府打交道出示,“赍以呈诣,动亦如此”,显示出各族对诸葛亮盟书的充分看重。

涉及诸葛亮有关盟誓的传说自唐代即开始流传,在唐代樊绰所撰的,记叙当时云南山川道路风物等情况的《蛮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石城川,味县故地也。贞观中为郎州,开元初改为南宁州。州城即诸葛亮战处故城也。城中有诸葛亮所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若仆,蛮为汉奴。”近年蛮以木撑柱。^[2]

味县此碑亦见《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和《大明一统志》志籍所载,所言或稍异,或说碑在柘东城(云南昆明),或载碑文文字稍异。从相关史志看,至少从汉晋以来味县已成为传统的会盟之地,《华阳国志》云:“味县,郡治。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3]至于《蛮书》所载味县此碑,或认为与诸葛亮无关,是后代汉族官府的附会,如刘琳先生就指出“此碑未必为诸葛亮所立,但应是隋唐以前汉族官府与少数民族的盟誓碑。”^[3]曲靖一带,有关传说至今广为流传。传说中盟誓的对象已演变成诸葛亮和孟获,称诸葛亮南征后与孟获在此会盟。如嵩明武侯祠就是为纪念这次会盟而建的。这座武侯祠始建于明代,初在嵩明城南,明万历四十年(1612)迁建于古盟台旁。祠内旧存明万历四十年《新建诸葛武侯祠碑记》述其建祠缘由,称:“(诸葛)公柔服蛮落,盟留七纵,厥功伟矣!”因此,“即于古盟旧址”建祠纪念。“古盟旧址”,即位于祠旁的古盟台,相传为诸葛亮曾与孟获筑台结盟时所筑。台畔原有《古盟台碑》,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建,已毁。至今曲靖城内还镌建有大型石雕,其内容即为象征民族和睦的“诸葛亮与孟获会盟”,以纪念曾经以“和抚”的民族政策善待西南各族

的诸葛亮。

关于诸葛亮与各族的盟誓碑,还有更奇特的传说。《南诏野史》(胡蔚本)下卷中述及在柘东城的盟誓,说法更为奇特:“(胡)蔚考此碑在大理府赵州之白崖,即武侯纪功铁柱。《滇志》皆载之。”^[4]²¹⁸胡蔚所言“武侯纪功铁柱”,实为南诏铁柱,坐落在云南弥渡县县城西约6公里的铁柱庙村。关于建柱的原因,有多种传说。盛行的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平定南蛮,缴兵器,铸铁柱记功,后由南诏世隆重铸。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彝族人民聚集铁柱庙,共同举行祭柱活动,是当地的传统节日。其实,南诏铁柱是唐代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现存的稀有文物之一,其柱体上有直行阳文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22字。“建极”是南诏第十一世王世隆的年号,建极十三年(872)时当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南诏铁柱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所谓“武侯纪功铁柱”其实是将古代云南的文物移花接木,附会到了诸葛亮身上。

另一些传说则应与诸葛亮的历史活动并无关联。云、贵地区的苗族、壮族善于织锦,他们传说是诸葛亮派人送去了蜀锦,传授织锦技艺,他们的织锦也就因而发展起来,于是苗族把他们的锦叫做“诸葛锦”,壮族称为“诸葛侗锦”。云南的傣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传说是诸葛亮给他们带去了稻种,教他们垦田插秧,打谷舂米。居住在云南德宏的傣族,还传说是诸葛亮教会他们使用牛耕。云南有遗迹名为“打牛坪”,传说就是诸葛亮教各族牛耕处。其实,西南各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诸葛亮之前早就存在。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南中与内地是“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交流和沟通有长期而久远的传统。先进的手工艺、耕作技术自然也在这种交流和沟通中不断的进行,既在诸葛亮之前相互学习,也在诸葛亮身后相互交流沟通。西南各族种植水稻和使用牛耕,汉晋时期已相当普遍,南中诸郡无不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已有明载。云南保山蜀汉墓出土的文物,更以实物形式证明了古代西南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达。由上可知,水稻种植和牛耕的传入,实与诸葛亮的历史活动无干。织锦之类的传说亦应如此。

各族人民还把他们的生活中的习俗,也与诸葛亮联系起来。傣族传说他们的竹楼是诸葛亮教他们修的,“泼水节”也与诸葛亮有关。相传傣族原来住在

低矮的草棚中,诸葛亮临别时,便摘下帽子留赠给他们。后来,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气,便想起诸葛亮在帽子的绸条上写下的嘱咐,“想命长,水冲凉;草棚矮,住高房”。于是,他们就仿照诸葛亮那顶像几块木块拼起来的、见棱见角的帽子,盖起了傣家的竹楼;而诸葛亮教他们冲凉,冲凉时大家相互泼水,后来便又形成了“泼水节”。在傈僳族、纳西族中,也传说“火把节”与诸葛亮有关。相传诸葛亮到了他们居住的地区,便教各族开水田种稻,又派军队送去稻种,当地各村寨为迎接举稻种的汉兵,便点着火把以驱散瘴气。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此后每年此日大家都点燃火把纪念,便成了“火把节”。

一些重要的交通设施,如桥梁等,也被传说为与诸葛亮有关。如澜沧江上的雾虹桥。雾虹桥古代即号称“西南第一桥”。它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上的重要关津,其使因澜沧江天堑分隔开来的博南古道和永昌古道变为通途。《蛮书》载:“兰沧江南流入海。龙尾城第七驿有桥,即永昌也。两岸高险,水迅激。横巨大竹索为梁,上布箬,箬上实板,仍通以竹屋盖桥。其穿索石孔,孔明所凿也。”^[5]《读史方輿纪要》载:“雾虹桥……武侯南征孟获,架桥济师。”《徐霞客游记》:“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七“雾虹桥”:“在永昌府城北八十里,跨澜沧江。古以舟渡,狭隘湍急,行者忧之。后以篾绳为桥,攀援为渡。武侯南征,架木桥以济师。元也先不花西征,始更以巨木,题曰雾虹。”^[5]

当然,与诸葛亮相关的传说,并非都是正面的、赞誉诸葛亮的,有些民族的传说则是贬斥诸葛亮的。西南不少民族传说诸葛亮给他们送去了稻种,帮助他们发展了生产,而有的民族也传说诸葛亮送去了稻种,但送给他们的稻种是煮熟了的,不能发芽,耽误了农时,造成粮食大减产,诸葛亮就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整他们,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历史故事,在有的民族中被传说成孟获七擒诸葛亮,并编成戏文长期传唱;在大凉山地区的传说中,诸葛亮则以凶恶、愚蠢的形象出现,他用种种欺哄吓诈的诡计去恫吓、欺压人们,却总是被聪明的当地人们及时识破、化解;在战争中他阴谋迭出,仍然总是被巧妙应对,结果是一次次吃败仗,被当地人们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在同一民族的传说中,诸葛亮也会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例如彝族。大凉山居住的主要是彝族。而

在贵州大方一带的彝族同胞中,则流传他们的先祖——头人济火(也称火济、济济火等)协助诸葛亮南征的故事。济火,彝名“妥阿哲”,彝族传说人物。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水西彝族酋长济火曾于黔西北和滇东部分地区亲迎蜀军,在今贵州西北积粮通道,协助平孟获有功,受封为“罗甸王”,世代统治水西地区。志籍对此亦有记载。《明史》有载:“自蜀汉时,济火从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国王。”^②明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载:“先有慕济济者,与普里部仡佬争为君长,迭有盛衰。其后有曰济济火,善抚其众,时闻诸葛武侯南征,通道积粮,以迎武侯。武侯大悦,……封为罗甸国王。”贵州大方县文化馆在1981年的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济火记功碑,碑文为彝文,残存174字,记叙彝族先祖济火的事功。

相对而言,对诸葛亮的毁誉不一,似乎地区性更强。学界普遍认为,诸葛亮南征终点在滇池,诸葛亮的足迹并未到洱海甚至澜沧江以西的滇西。但滇西地区的诸葛亮传说和遗迹却最多,且对诸葛亮赞誉有加,溯自唐代便如此。《蛮书》在紧接记述雾虹桥一段文字后,载道:“昔诸葛征永昌,于此筑城。今江西山上有废城遗迹及古碑犹存,亦有神祠庙存焉。”^[4]《蛮书·云南城镇第六》载:“永昌城……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边大铜川,亦有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庙,土俗咸共敬畏,祷祝不阙。蛮夷骑马,遥望庙即下马趋走。”^[2]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文中引《龙陵县志》卷十六曰:“诸葛城,在高黎贡山分水岭上,相传诸葛亮南征驻兵于此,一宿筑城者。”又引《龙陵县志》卷十五:“《孔明碑》,在平戛三江口半山上,万丈悬崖,人迹罕至,俗传武侯征蛮时所立,《碑》文曰汉丞相诸葛亮到此;又曰诸葛到处无人到。未知孰是。今字迹剥落无可考证。”云南下关市有一座清光绪间赵州牧镌立的大理石碑,正中楷书“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碑原立于下关市西三公里的天生桥旁山上,后又移至下关市内市图书馆前广场中。

滇西尤以保山为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最多的地方。历史上保山曾有众多的武侯祠,也有许多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如诸葛堰、诸葛营,诸葛旗台,营盘山,以及哑泉、盘蛇谷等等。影响较大的如诸葛堰,在今保山城南汉营乡。据清·雍正《云南通志》载:“诸葛堰有三,武侯所筑,俱在。城南十里法宝山下曰大堰……其东曰中堰……又东曰下堰……。”^③大堰(也称大海子)在汉营西法宝山下,面

积一千余亩;中堰(也称中海子)在汉营东,面积一百七十余亩,堰中有一土台,相传是“诸葛旗台”;下堰(也称小海子)和中堰仅一堤埂之隔,面积二百余亩。诸葛堰的水源来自保山城西的九隆池,秋冬蓄水,春夏放水灌溉后又能耕种。原受益面积为七千余亩,1955年将堤埂加高后增大了蓄水量,现受益面积增至一万余亩。

对滇西众多的诸葛亮遗迹,前辈学者曾有论及。方国瑜在《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文中引《龙陵县志》记述的“诸葛城”和“孔明碑”后“按”称:“诸葛城与《碑》,当出附会,然其地有此传说,则可知也。”向达在《蛮书校注》中也指出:“滇西武侯遗迹甚多,即以永昌一郡而言,诸葛堰、诸葛营、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比比皆是。皆俗语之流为丹青者耳。武侯南征,初未尝至永昌也。”^[5]当然,保山还有曾让南征的蜀军士卒失声的哑泉、火烧藤甲兵的盘蛇谷等等遗迹。由“哑泉”“盘蛇谷”可知,类似的传说和遗迹应源自元明之际诞生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受《三国演义》中故事的影响而近几百年中才出现的。

因其在西南各族中影响巨大,诸葛亮身后,汉族官府往往有意借用这种影响,冒用诸葛亮之名,以实现他们在这一多民族地区的种种图谋。前引关于唐代味县的盟誓碑,刘琳先生认为“应是隋唐以前汉族官府与少数民族的盟誓碑”,此碑就有后代汉族官府借诸葛亮威名达成与相关民族结盟之嫌。另一些目的性则更清楚。《隋书·史万岁传》载:“先是,南宁夷爨翫来降……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击皆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二河……”这里把诸葛亮说成了早知数百年后事的先知。清代冯甦《滇考》中记载此事则更玄乎:“(隋开皇)十七年,南宁蛮爨翫来降,以为昆州刺史,明年复叛。乃遣太平公左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帅众南征。从越嶲进兵,经马湖番山,自蜻蛉川过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据要害,万岁皆破之。行千余里,见《诸葛武侯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遂命仆其碑,下复有字:‘隋开皇十九年,史万岁过此,复立石碑。’万岁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之。”^④据文中所述,此碑应在洱海附近,并非诸葛亮足迹之所至;且其他志籍对此碑从未提及,惟

史万岁此次征战时看到且碑文内容只与史万岁相关,显系史万岁有意作伪。唐代天宝年间唐王朝与南诏交恶,时有征战,后来唐王朝在清溪关一带设立屯兵点驻军以防南诏入侵,其中之一也命名为“武侯”。史万岁借诸葛亮威名,无非是想证明自己征爨翫的武功堪与诸葛亮南征相比,也含借诸葛亮威名震慑爨翫之意;名为“武侯”的屯兵点,则是在西川的唐代官员借诸葛亮威名恫吓、震慑西南各族之举。

借用诸葛亮之名以实现自己图谋的,非惟汉族官府,连外国人也这么干。佉族“除奉原始之拜物教外,并笃信诸葛孔明。彼曹谓一切制度,皆为孔明所订。”近代外国传教士想在佉族中传教,但佉族人只笃信孔明老爹,于是传教士还编造谎言,说“耶稣是孔明的弟弟”,借诸葛亮之名以引诱佉族人入教。

1975年成都武侯祠文管曾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到云南踏勘有关诸葛亮的遗迹,笔者与行。当时云南省博物馆曾组织一次小型的馆内的座谈会协助我们了解相关情况,与会的多为云南的“老文博”,熟悉云南各地的遗迹、遗址,如孙太初等专家。据这些“老文博”说,名为诸葛亮的这些遗迹,真正与诸葛亮有关联的并不多,有的可能是诸葛亮之前的遗迹,有的是附会,有的则是后代的汉族官府借用诸葛亮威名之举,如一些叫做诸葛营、诸葛城的,就有不少是后代王朝驻军地遗迹。这自然也是后代汉族官府冒用诸葛亮之名实现自己图谋之举。

二、对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的认识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西南各族中这些亦誉亦毁、错综复杂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呢?

诚如诸葛亮在汉族等民族中被看成智慧的化身、“鞠躬尽瘁”的贤相典型、“淡泊明志”的模范一样,“诸葛亮文化现象”在西南各族中也具有多种代表性和象征性,其复杂的表象背后,蕴藏有深刻的寓意,需要我们仔细分辨,区别看待。

认为诸葛亮给各族传去了稻种,教各族使用牛耕,教给各族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等传说,其实是把诸葛亮看成了传播先进文化的代表。然而,先进文化的传播绝不是单向的,既有从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传播给西南各族的,也有由西南各族居住的地区传播给汉族和其他各族的,还有从中国传往域外和从域外传来中国的。这种传播在诸葛亮之前及其身后都在不断进行,不绝如缕,并非诸葛亮的历史活动所致。不过,诸葛亮南征不单以武力征服而“攻

心”“心战”;南征后诸葛亮努力“和抚”、安定各族,与之和睦相处,使西南的一些民族充分感受到其善意和诚意,感受到其美好的愿望。一些民族如傣族、景颇族、佤族等,至今仍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这种对亲友或邻里长辈的亲昵称呼,体现出相关各族发自内心的敬重,显示出对其“和抚”各族的善意、诚意的认同。于是,这些民族便为诸葛亮赋予了种种善良、进步、美好的作为。先进文化自然是进步、美好的,西南的一些民族便把先进文化的传播附会于诸葛亮以示赞誉。

至于在滇西(尤其是保山)出现大量赞誉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则可能与诸葛亮尊重各族习俗、尊重“九隆神话”有关。“九隆神话”见《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男子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语言,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尾,臂胫割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

“九隆神话”为“南中昆明祖之”,是洱海至滇西广大地区中许多民族普遍认同的、关于自己民族起源的神话,影响深远。“古藏缅语族中的一些部族以龙为图腾,如古代的哀牢,后世的白族等均有感龙而生的传说。”^[6]唐代时建立南诏国的蒙舍诏的蒙氏家族就以“九隆神话”为其族之源,《蛮书》记载南诏:“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后”。^[7]《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他用连环的画面,先画了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接着画了神龙,画神龙生下当地少数民族,又生下牛、马、羊等牲畜。再往下诸葛亮画了官吏“乘马幡盖”,四处巡视并安抚各族,赈济他们。最后诸葛亮画的是各族牵着牛,担着酒,带着“金宝”向官府缴纳贡品。诸葛亮画图谱时正是遵从了“九隆神话”的传说。尊重“九隆神话”,体现诸葛亮对各族习俗的尊重。这种善意在相关各族中大获赞许,“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这自然会在洱海至滇西的相关民

族中引起长期的强烈的好感。从崇奉“九隆神话”各族的眼光来看,对尊重这一神话的诸葛亮加以赞誉甚至奉其为神,恰恰也是维护了本族所崇奉的“九隆神话”,维护了本民族的尊严。

滇西尤其是保山一带,汉晋时有很多汉族移民,如吕氏等。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时,永昌郡五官掾功曹吕凯和郡丞王伉就坚决抵制雍闿等人的反蜀叛乱,“执忠绝域,十有余年”,尽忠于蜀汉,连诸葛亮都赞叹“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⑤保山一带至今有不少吕凯的传说和遗迹。保山城北十五公里的金鸡村内,有传为吕凯的“插旗石”。村内还有“吕公巷”“吕公祠”“吕公故里”等。村南一里多有一土台,传为吕凯反对雍闿叛乱时的点将台。^[8]这些纪念吕凯的地名和建筑,说明吕凯维护统一的事迹在保山一带影响很大。对百姓而言,分裂割据就意味着不安定、动乱甚至战争,就意味着饥寒交迫、家破人亡。人们尊崇维护安定、维护统一的吕凯,正是在表达自己反对动乱、向往长久安定的愿望。对吕凯尚且如此崇奉,成功地维护了南中地区安定局面、努力使汉族移民与当地各族和睦相处的诸葛亮,在滇西尤其是保山一带有众多传说和遗迹,也就不难理解了。

贬斥诸葛亮的传说或遗迹,或出现在某些民族、或出现在某民族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们中。这也许与巨大的战争创伤有关,也许另有原因。四川大凉山地区蜀汉时属越嶲郡,诸葛亮南征在这里与夷帅高定曾有大战。诸葛亮一举击败高定的主力、攻占其老巢邛都并俘获了高定的妻子儿女,但高定仍召集其残部二千余人“求欲死战”,终至战死。从高定惨败后仍能召集二千余人“死战”来看,其前的大战中兵力自然远多于此,死伤者数目应以万计。蜀汉延熙三年(240)张嶷担任越嶲太守后,也杀了“已降复反”的苏祁邑君冬逢和其弟隗渠,以及“昔手杀龚禄”的斯都耆帅李求承;在将定笮、台登(四川冕宁)卑水所产盐、铁和漆等收归官营时,张嶷还杀了定笮“率豪”狼岑。^⑥尽管汉晋以后这一地区不乏民族的迁徙,但这些屠杀的血腥却仍积淀在当地,留在了那里人们的记忆里。

被当成了汉族官府的象征,也应是贬斥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出现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诸葛亮身后汉族官府不断冒用诸葛亮的名义行事,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的代名词,西南各族其实也用诸葛亮一词指代汉族官府。《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

亮与相关各族的“瑞锦”“铁券”等盟书,至一百多年后的东晋时西南相关民族与汉族官府打交道,仍“赍以呈诣,动亦如此”。这些手持“瑞锦”“铁卷”的已是诸葛亮当年与之交道的各族人的后代了,他们自然也清楚自己并不是在与诸葛亮打交道了,但他们仍“赍以呈诣,动亦如此”,其实就是把诸葛亮的承诺看成是汉族官府对各族长远的承诺,也就是把诸葛亮看成了汉族官府的象征。诸葛亮身后汉族官府在西南地区不乏种种恶行,自然会激起西南各族反感甚至仇恨。汉族官府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变动,而诸葛亮却始终被作为汉族官府的象征,那些被汉族官府恶行激起的仇恨也被有的民族算到了诸葛亮的账上。因而,诸葛亮足迹所未至地区中有的民族也贬斥诸葛亮,就不难理解了。在讨论古代昆明族相关情况时,有学者认为:“昆明族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大的一个民族,到唐时发展为乌蛮,是我国彝族的先民之一。”^[9]前已述及,同为彝族而贵州水西的彝族崇奉诸葛亮,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贬斥诸葛亮。

注释:

- ①《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 ②《明史》列传二百四“贵州土司”。
- ③《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一“水利”。
- ④冯甦《滇考》上卷“史万岁平爨玩”,见李孝友、徐文德《滇考校注》。
- ⑤《三国志·吕凯传》。
- ⑥《三国志·张巖传》。

参考文献:

[1] [晋]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M]//[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 1984:424—441.

[2] [唐]樊绰. 蛮书·云南城镇第六[M]//[唐]樊绰,撰,向达,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126—170.

[3] [晋]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宁郡·味县[M]//[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 1984:403—404.

[4]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 [唐]樊绰. 蛮书·山川江源第二[M]//[唐]樊绰,撰,向达,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37—54.

[6] [晋]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M]//[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 1984:333—377.

[7] [唐]樊绰. 蛮书·六诏第三[M]//[唐]樊绰,撰,向达,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55—81.

[8] 成都武侯祠文物保管所. 从诸葛亮在云南的遗迹试谈他的民族政策文物[J]. 文物,1976,(4):64—71.

[9] 王文光,段丽波. 昆明族源流考释[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6):106—110.

若此昆明族“是我国彝族的先民之一”论述无误,则崇奉“九隆神话”的昆明族后代中也有贬斥诸葛亮的。可知对诸葛亮或褒或贬,在某一地区的倾向性应比在同一民族中的倾向性更强。

综上所述,西南各族中亦誉亦毁、错综复杂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或与诸葛亮的历史活动有关,或与后代汉族官府冒用诸葛亮的种种举动有关。赞誉诸葛亮,把他视为传播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对诸葛亮努力“和抚”、安定各族,与之和睦相处的善意和诚意的肯定,是对诸葛亮尊重各族习俗、尊重“九隆神话”等尊重各族表现的肯定,它反映的是西南各族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各族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南征中的战争创伤,以及诸葛亮在其身后被视为汉族官府的象征,则是某些地区某些民族中出现贬斥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的重要原因,其实质是西南各族对动乱和战争贬斥,是对造成民族隔阂的种种恶行的贬斥。